

華人基督徒合一路上的諸種障礙

曾慶豹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提要

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傳教背景，以及不同的時空下傳播到中國或華人地區。這場 500 年前的改革運動以及其後在歐美世界的多元發展，每每在華人地區論及天主教與基督（新）教的差異時，形成對峙的立足點。因為華人基督（新）教從聖經、禮儀，教義等無不有自身的一套解釋，所以在與天主教作比較時，往往都著重於突出彼此的嚴重分歧。不但如此，有時候甚至還引起基督（新）教內部的分裂和迫害，因此梳理清楚這些現象背後究竟存在著哪些似是而非或扭曲的言論，將合一路上的具體障礙一一清掃，才可能有進一步論述合一精神和方式的空間。本論文內容包括：「天主教的話題：基督（新）教的合一運動與反合一運動」、「從普世教協到聖經翻譯：衝突的主要話題」，並以上話題所涉及的主要著作、人物和事件等等。

關鍵詞：天主教、新教、合一運動、反合一運動、聖經翻譯

宗教研究

投稿時間：2018.01.04；接受刊登：2018.07.25；責任編輯：潘馨逸

壹、前言

《馬禮遜回憶錄》多處記述了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FRS (1782-1834))初到澳門的情形。他曾積極地與天主教徒打交道，作為東印度公司的翻譯員，也曾嘗試為天主教受到清廷官府的禁令而做道德辯護。據說，基督教與天主教間的「摩擦」，從「傳教偉人」(基督教喜歡如此稱呼)馬禮遜就開始了，當他涉足澳門時就有傳出「偷羊」之事，專拉攏天主教徒，他所編撰的傳教小冊還特別引來天主教高層的關切，並指示凡拿到馬禮遜所發送的冊子，一概燒毀。

馬禮遜曾編輯印刷發行一些刊物，某些內容被澳門天主教代理主教視為是反天主教的，並且是相當不友善的言論，於是後者向澳門立法局提出告訴，希望可以立即禁止馬禮遜發行刊物，甚至還投訴到其僱主東印度公司去。此事當然也引起馬禮遜的不滿，因此還就此撰文投稿到廣州出版的英文報紙《廣州志乘》去。饒富趣味的是，他們之間竟然展開了一場有關言論自由的爭辯(顧長聲譯，2004：284-286)。因此有人認為，這似乎是為何馬禮遜不得不轉到馬六甲去的原因，他的轉移多半跟他在澳門受到阻撓和傳教成效不彰有關。¹

著名的基督教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曾與山西天主教恩格針對兩教的不同做過爭論，之後又特別針對天主教發行的《對付新教徒的捷徑》小冊展開辯論，分別為1877年和1886年(李憲堂、侯林莉譯，2005)。然而，兩派間最著名的「摩擦」即是於1884年《辨惑卮言》再版後。《辨惑卮言》原為晚清著名的中國天主教徒李問漁於1881年出版之作，專為天主教做辯護，認為「耶穌教」對天主教的批評都是一些不真實的惡言，以假亂真。

接著，英國浸禮會傳教士秀耀春(Francis James, 1851-1900)於1890年出版《兩教合辯》作為回應，之後則引來了天主教內部針對該書發行了《讀《兩教合辯》論》以反駁秀耀春之作。同年，新教這方又接著出了一本《兩教辯正》，為美北長老會傳教士倪維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 1829-1893)之作，將這一來一往的兩教論戰推向頂峰(倪維思，1913)。²《兩教辯正》爭論的要點大體圍繞著「對聖經所持的態度」、「聖母與偶像崇拜」，以及「教宗的地位和作用」這三個主題。這些基本問題成了基督教對於天主教評述的要點，爾後也一

¹ 馬禮遜的聖經翻譯工作多處得利於天主教，這些都是他在澳門期間的重大收穫，可參曾慶豹(2012：11-24)。此文也收錄於曾慶豹(2017)。

² 另參見田燕妮(2014：253-264)。

直沒有太大的變化。然而，《兩教辯正》總是一次對話的表現，將兩者的差異都揭示出來了。³民國時期的代表作為丁良才（Frederick Charles Henry Dreyer, 1872-1953）於 1936 年出版的《羅馬教內幕》，這算是一本流傳較廣的著作，但未見有特別針對天主教做出較為持平介紹的。

貳、「聯合祈禱會」引起的衝突

1960 年代是普世教會合一運動推行得如火如荼的一個年代。

普世基督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簡稱 WCC 或普協）於 1948 年在阿姆斯特丹成立，標誌著推動已久的基督教合一運動（Ecumenical Movement）終於有了具體成果。普世合一運動主要推動四個方面的工作，分別是「傳教事業」、「青年工作和基督教教育」、「生活和勞動運動」、「信仰與教制」。1961 年於印度新德里舉行會議時，普世教會合一運動又取得突破性的進展，獲得了東正教的加入。然而，基於認為唯有羅馬大公教會才是「獨一的、神聖的、普世的、宗徒創立的教會」，儘管受到普協的邀請，1961 年的會議教廷也派了代表列席，但天主教方面仍然拒絕在立場上有任何軟化，主流的思想和態度仍然是認為這些分裂出去的教會，不論是東正教或是基督教，都應回到真正的教會——羅馬大公教會的懷抱，所以始終維持著保留和觀望的態度。天主教廷的態度和行動須等到 1962 年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召開後，才出現重大的轉變，以及對分裂出去的新教和東正教派釋出較為正面的回應；一方面不輕忽各基督教派團體間的差異，另一方面亦不忽視雖然分離卻仍然存在的聯繫：「從我們當中分裂出去的弟兄們，也在實行著基督的諸多神聖行為。」

在 1964 年 11 月發佈了《大公主義》（*Unitatis Redintegratio*）的法令上，天主教會強調「適應教會各種需要與時代的要求，為推動基督徒的合一，而發起和組織的各種活動與措施」，尤其是處理教會在歷史上的分裂，呼籲願意做出最大的誠意致力於重修「分離的弟兄與公教會的關係」，於是正式進入了真正意義的普世教會合一運動（陸達誠，1969：95-109）。梵二會議期間，教廷也邀請了不少基督教界代表列席會議。在大公主義的執行工作方面，除了一些社會和技術方面的合作，更談到「聯合祈禱」一事：

³ 天主教方面反駁基督教的出版計有：法國耶穌會士柯德烈（1898）、中國天主教徒張雅各伯（1907）、法籍神父陸地愛（1922）等。

「為合一」而召集的祈禱會，以及大公的集會上，不單許可公教信友，而且該鼓勵他們跟分離的弟兄聯合祈禱。這樣的聯合祈禱，無疑地為獲得合一的聖寵是最有效的方法，而且也是公教信友與分離的弟兄仍然聯合一起的真誠表現。（《大公主義法令》，19641：7）⁴

自1965年始，天主教與普世教協在一些區域進行更深入的合作，例如組成了天主教與普世教協聯合工作組（Joint Working Group），天主教的神學家也成為了「信仰與教制委員會」的正式會員。從1968年開始，天主教也派遣觀察員參與普世教協會議。

在普世教會協會和梵二的兩個重大異象和氛圍下，臺灣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做了一次重大的嘗試，他們於臺南舉辦了一次「聯合祈禱會」的活動。這個活動的開始，同時也宣佈了它的結束。因為在一片反共護教的意識形態主導下，普世教協本來就被視為信仰不正統的團體，同時也意味著凡與此組織有往來的，如長老教會者，就會被視作是在信仰立場走上歧路，現又加上欲與天主教進行「聯合祈禱會」，則更是罪加一等，被視為背離了更正教的基本原則，於是就引起了「護教者」在《福音報》上的大肆撻伐。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作為普世教協在台唯一的代表，他們是非常積極地響應合一運動的主張和行動。而臺灣天主教方面在施行梵二大公會議的合一運動上，也熱情地伸出手來與「分離的弟兄」聯誼，其中三位關鍵人物分別為黃彰輝、羅光和高思謙。這一場合一運動是從臺南開始的。

為響應教廷的合一運動，天主教方成立了「促進基督徒合一秘書處」，而基督教方則是以四大教派領導為主，分別是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灣聖公會、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以及基督教臺灣信義會，一起藉著上述交誼的機會，彼此都認為將來應有更多的互動和聯繫。1964年，羅光主教與一眾神父一同應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議長黃彰輝之邀，到臺南神學院講述梵蒂岡大公會議的情形，並相繼作了幾次演講，雙方都受到極大的鼓舞。儘管一些基督教小宗派的攻擊

⁴ 另見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2013：1436-1443）。天主教與基督教各大宗派取得具體成果，是1982年在利馬召開的會議中，通過了《利馬禮儀》表達了在「信仰與教制」方面的突破，1983年普世教協的大會崇拜中使用了《利馬禮儀》，展示了在聖餐裡中達到團契和共融的信仰。1999年10月31日，路德宗世界聯盟與教廷宗座基督徒合一促進委員會代表聯合發表了一份聲明，見收錄於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2013：1807-1812）。

和發出質疑的聲浪，天主教和長老教會還是成功地於 1965 年 11 月 24 日成立了「臺南基督教天主教神職人員聯誼會」(Clergymen's Club)。

聯誼會成立後，高思謙神父被選為首任會長，秘書則為彌廸理牧師。通過此次聯誼會，大家提議舉辦令人鼓舞的基督教合一禱告會，一次在臺南神學院，一次在天主教神學院。天主教的代表性刊物《教訓萬民》(*Teaching all Nations*) 1965 年 4 月號的專題為「合一運動在臺灣」，對此做出了特別報導（方豪，1966：31-39）：

根據方豪的回憶，他曾受周聯華之邀到台中真耶穌教會參加過一次令他印象深刻的合一會議。時為 1963 年 4 月，周聯華親自到溝子口拜訪方豪，雖然未遇，卻留下了信函，邀請方豪參加同月 15 和 16 日在台中的會議，之後方豪了解了原委並向教區報告，獲准同意出席。

方豪於 15 日晚上以「何謂天主教？」做分享，地點就在臺中真耶穌教會總部，出席者包括了周聯華、黃武東、馬永梁（聖公會聖約翰座堂會長）、馮國光（行道會）、方大林（衛理公會）、丁樂山（行道會）、鄭兒玉（臺南神學院）、賴英澤（臺南神學院）、穆謁仁（公報社）、龔天民（臺中信義會神學院）、劉仁傑、許遵道（門諾會）、金仲庵（臺中信義會神學院）、楊約翰（真耶穌教會）、魏約翰（真耶穌教會）、張翁燕娟（真耶穌教會）、林奉生（真耶穌教會）、謝順道（真耶穌教會）、黃以利沙（真耶穌教會）等。這些代表從 1959 年就開始聚集在一起，以普世教協名義討論「信仰與教制」的問題。這次會議是第一次邀請天主教代表參與，周聯華則於第二日報告「何謂東正教？」。

在此會議中，周聯華一些智慧和巧妙的話，給方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有一段是這樣說的（1966：37）：

Protestant 應該有些 Catholic 精神；Catholic 也應該有些 Protestant 精神。

天主教傳自彼得，東正教傳自約翰（由於他們的神秘學說），基督教傳自保羅（由於他們的反抗意識）；……。

難道天主教的彼得不是我們的彼得嗎？我們的保羅不是他們的保羅嗎？難道約翰不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嗎？

馬丁路德只是逼上梁山，如果不是天主教施用壓力，一開始即實行「教內」改革，也不必在「教外」改革了。

1963年9月27日，項退結曾以天主教教友的身份到嘉義基督長老教會對宣教師演講，比較特別之處在於將諸多天主教的慣常術語轉換成基督教用語（項退結，1963：23-29）。另外，在臺北雖然曾有神父與牧師為合一的事而聚集會談，但遇到的阻力卻非常巨大，不像在臺南的情況那樣和諧。儘管如此，不少屬於聖公會、信義會及衛理公會的代表還是表明樂於參與交談，並贊同彼此應多有互動，但因外界的質疑，還是要先小心地慢慢進行為宜，故要求再等待一段時間以作慎重的準備。臺北的教會曾同意舉行一次聯合慶祝聖誕聚會，但最終還是因反對的聲浪過大而取消。既取消聯合慶祝聖誕，天主教方面則建議代之以聖誕日大彌撒，在臺北市體育館舉行，並邀請牧師參與，其中有幾位牧師接受邀請，也前去參加，但他們回到教派內部，仍不免受到攻擊。而在臺南，基督教與天主教的「聯合祈禱會」終於還是在1966年4月順利舉行了。然而，這件事的後續發展可謂一發不可收拾，基督教內部反對天主教的力量開始大集結，並在「護教反共」的旗號下，把反普世教協的向度擴大到反對天主教，於是在基督教內部，長老教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曾慶豹，2016）。

5

在各個教派背景的人士全面攻擊「四大教派」（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中華聖公會／中華衛理公會／臺灣信義會）之同時，長老教會成了眾矢之的，被說與「異端」天主教聯合是「出賣耶穌」。陳維屏、賈嘉美、盧祺沃等都相繼地發表相同的言論，甚至，遠在美國的趙天恩也特別寫信來，反對天主教、反對普世教協，認為與天主教的往來嚴重地背離了基督教信仰，呼籲要組織委員會來揭發異端的合一運動。一個跨教派的基督教組織：「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應勢成立，並把批判普世教協和反共運動的戰線，拉長到對天主教合一運動的批判。⁶

與合一運動相關的事件中，最戲劇性的就是關於基督教報刊《天僑新聞》的易手。《天僑新聞》於1960年開始發行，與1957年創辦的《福音報》，並列

⁵ 這個風起雲湧的年代，基督教內部的矛盾與衝突全面地公開化。以下部分內容取自拙著《約瑟和他的兄弟們》。

⁶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華民國分會成立的這一段前後時間，參見《福音報》第284期到296期，從1966年1月到3月間，都有針對此事的報導。

為流傳於基督教界的兩大報刊，由於特別刊登並鼓勵參加天主教與基督教聯合祈禱會的消息，結果「被迫」要讓創社及發行人楊石林結束該週刊，而表面上的說詞則是要與《福音報》合併的關係（《福音報》第 271 期，1965/10/31）。《天僑新聞》受到的攻擊可謂相當激烈。1966 年 1 月 25 日，臺北的教會有百名牧師集會，公開斥責為「少數人盜用基督教名義妄自與天主教聯合祈禱是褻瀆真理」（第 284 期，1966/01/30）。

由於擋不住排山倒海而來的質疑與批評，《天僑新聞》因此一事件而於 1965 年 8 月被迫停刊，發行人楊石林最後也被迫將此發行五年多的報刊拱手讓人。該報於 1967 年 1 月 15 日復刊（第 251 期），發行人則轉成了李約伯，該期首頁刊出「本報緊急啟事」，開始的一段文字寫著：「本報原發行人楊石林牧師願本愛心，將天橋新聞無條件饋送新發行人李約伯牧師。」接著越來越多的人士相續發表批評天主教的言論：

「基督教與天主教是水火不相容的」（陳維屏，總統牧師）

「聯合祈禱會是出賣耶穌的行為」（賈嘉美，中原大學創辦人、基督書院院長）

「開四百年前的倒車」（盧祺沃，佩帶聖經公會主席）

「天主教是異端」（某長老會牧師）

「路德宗信義會出賣了馬丁路德」（《福音報》，讀者投書）

其中有一篇讀者來函最引人注目，作者署名為 Jonathan Chao，他的來信全文刊出，由盧祺沃譯出，信中明確表示一切事端都是由聯合祈禱會所引起的，認為這場合一運動已來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因此呼籲組織研究和策略小組來應對這場挑戰，目的是「揭發邪惡」並「為真道而作屬靈之戰」。此人即是趙天恩，中華福音神學院創立時的第一任教務長，其父即為改革宗翻譯社負責人趙中輝。趙天恩（《福音報》第 289 期，1966/03/06）在投書上如此說：⁷

⁷ 趙天恩父親趙中輝，即是打著真正的「改革宗」招牌來糾正在台灣失去了「改革宗」的信仰精神和立場的長老教會，成立翻譯社、發行《信仰與生活》刊物、出版了諸多以「正統」或「加爾文主義」之名的著作。

最近一月三十日在臺北舉行的「天主教和基督教聯合祈禱會」證明教會內的領袖離經叛道愚昧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起初是漠視聖經真理，然後漸在神學院裡「修正」聖經，再後便是不信「神的話語」（提後二：十五）最後落到不敬虔的地步，隨著「異教徒」向虛無膜拜——與離經異端的天主教徒一起崇拜起來了。

我們願意與你們全心一意站在一條戰線上為真道而作戰（屬靈的戰爭）。無疑的這些創辦「聯合祈禱會」的人是有整套計劃要「合一」臺灣的基督徒，並且偽裝是「在基督裡合一」，請叫各信徒注意他們的印刷品，都是「開明」或「新派」人士執筆，完全是背棄了「一次交付的真道」。（第 289 期，1966/03/06）

盧祺沃（1966）可謂是反對聯合祈禱會最為積極的人士，他除了主動譯出 Jonathan Chao 的信函，也多次在《福音報》的社論中分析關於天主教以及合一運動，他認為：「這種奇怪的聯合是離經叛道的」，「背後即是一套新神學的勢力」（第 284 期，1966/01/30），並稱讚一面倒反對聯合祈禱會的《福音報》是「美好的作風」（第 285 期，1966/02/06）。

事實上，反對「天主教與基督教聯合祈禱會」的主張，主要是根據某種對天主教的特定解釋而來，這片面訊息的主要來源是中國信徒月刊社王永信的《真道手冊》所提供的。此書一手批判普世教協是「大背道」、最大的異端，另一手則批判天主教，指稱她是啟示錄中所斥責的「大淫婦」。該書的內容曾全文轉載刊於《福音報》第 296 期（1966/4/24）。這些在長老教會圈外的教派，藉反對「天主教與基督教聯合祈禱會」，將反共與反普世教協運動推到最高點，反對與天主教交往和任何形式的「合一運動」成了他們最立即和明確的行動。

為了表示堅決維護純正信仰，反對「基督教與天主教聯合祈禱會」，全台三十三個教派領袖聯合召開會議，會後一致表示了鮮明的立場，並發表了一紙〈告同道書〉，表達了他們的嚴正立場並宏揚真道。這份〈告同道書〉係由上述人士於 2 月 3 日上午十一時，假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號美而廉餐廳集會討論產生的，席中推請了寇世遠、盧祺沃、吳勇、俞汝良等四人負責起草。據說此一〈告同道書〉印刷了五萬份，分派給各教會。〈告同道書〉全文不僅刊於《福音報》頭版頭條（第 285 期，1966/02/06），《中國信徒月刊》也一併轉

載(1966)。⁸《告同道書》中羅列出了天主教的十大罪狀(第292期,1966/03/27):

茲舉出其錯謬之犖犖大者,簡述如次:

一、擅改經訓—以教皇令諭,宣告馬利亞無原罪,目為中保,向之求告。

二、偷竊神榮—教皇高居寶座,接受教徒跪拜,又造各種偶像,使人膜拜。

三、歪曲教義—教人刻苦己身,鞭體自贖,重行為,積功德,不講因信稱義之救恩要道。

四、濫用權柄—曾售贖罪券,倡行煉獄之說,以資廣斂錢財,賄賂罪人良心。

五、不傳真道—不傳基督福音,拯救靈魂,不按正意解經,造就信徒,正如耶穌責備法利賽人說,你們走遍海洋陸地,勾引一個人入教,卻使他作地獄之子。

六、徒重形式—以望彌撒唸經,製造神秘氣氛,有敬拜的形式,無敬虔的實意。

七、轄制人性—從事聖職之神父修女等,硬性規定不准嫁娶,違反神當初造男造女的本意。

八、包辦聖工—教皇定規惟有聖品人可作聖工,失去教會肢體配搭事奉之應有功能。

九、封閉聖經—不容許其教徒保有一本完整的聖經,以遂其愚民政策。神父唸經則讀拉丁文,令人莫測高深,不知所云。

十、政教合流—梵蒂岡對世界政治,極感興趣,政治亦入宗教,使永生神的教會失去分別的立場。

⁸ 《福音報》第285期,1966/02/06。《中國信徒月刊》第五卷第四期(1966)也轉載了此一〈告同道書〉。

當然一切的重點即在抨擊「基督教與天主教聯合祈禱會」，他們甚至用了極為尖銳的言論批判天主教，認為他們此舉是滲透，也是收買基督教：

我們看出這次「聯禱會」的出現，不過是一連串陰謀詭計的開端，如果任憑發展，後果不堪設想！這次「禱告」既可聯合下次「講臺」亦可交換，而「望彌撒」與「領聖餐」輪流在天主堂和禮拜堂舉行，也就勢在必行，長此以往，必將形成一種態勢。

我們實在看不出基督教與天主教之間，直到如今有任何共通的地方，可以本著聖經交通印證；有任何正當的理由，可以共聚一堂齊聲禱告；有任何穩當的基礎，可以合而為一同奔天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天主教所倡導且為極少數基督徒所附和的合一運動（Ecumenical Movement），不過是併吞基督教的一種手段。（第 292 期，1966/03/27）

所以〈告同道書〉總結地認為，天主教是異端，基督教與天主教毫無相通之處，當然也無須有任何的合作可能，重點仍然是打擊普世教協的合一運動。

9

特別令人玩味的是，當基要派的基督徒如此激烈地反對天主教，斥責其為異端、大淫婦，但他們所敬愛的蔣介石夫婦與他們口中的異端——天主教——可是有著深厚的關係，甚至在靈性及友誼方面都是超過與基督（新）教牧師的。例如蔣介石書房中擺了一尊「耶穌像」，他邀請天主教教友吳經熊重新翻譯《新經》（即新約）和《聖詠》（即詩篇），且花了很大的精力針對吳經熊的譯文進行詳細的眉批、修譯，靈性上的互動很深；又如宋美齡外婆家的天主教背景，以及其家族與徐光啟的幾代親家，不難理解她何以接受並擔任了長達廿五年輔仁大學的董事長一職，而且，她與于斌樞機主教、教廷都有深厚的情誼。但是，當基要派基督徒在攻擊天主教時，他們當然是不會考慮到這些情況的。

參、「聯合聖經譯本」的未竟之功

⁹ 其他坊間流傳批評天主教的小書包括有：徐萬黎編著《馬丁路德為何要作改教運動》（1959年6月初版，自印；1962年2月再版，台灣宣道社出版）、以及署名作「主的使女底波拉」著者的《以法蓮是我的長子——獻給羅馬天主教徒》（1961）和《與羅馬天主教徒檢討主日彌撒經典》（1961）兩本小冊。

由於長老教會在普協的成員名單中，反對普協者就以臺灣長老教會為攻擊目標。此外，另一位因合一運動而備受極度批評和攻擊的，就是周聯華牧師。他即是被視為與「大背道」為友、與「大淫婦」交往的頭號「異端分子」。前者是因為與長老教會往來籌辦「基督教來台百周年大會」而得來的罵名，後者則是因為在聖經公會倡議下與天主教共同聯合翻譯聖經而遭罪。¹⁰《周聯華回憶錄》中有兩段話可以看出此事背後的複雜性，首先是關於《現代中文譯本》（周聯華，1994：320-323）：

當時反對的聲浪非常的強烈，但是因為這是傳福音非常重要的一環，我不計毀譽的全力以赴。

提到「共同譯本」，周聯華也如此慷慨激昂地說：

我經過長期的禱告和思考，認為這是十分需要的工作。如果因此而受批評和攻擊，也是意料中事。我只問自己在上帝面前的感動，自己的良心請聖靈帶領，至於個人的名譽和前途，我早已置之度外了。（1994：320-3）

事實上，合一的最大阻礙也許就是聖經譯名的分歧。如果有一個共同翻譯的聖經，彼此的距離就會拉得更近一些，至少它是合一運動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起步，其他形式的活動還不是最主要的。從聯合祈禱會開始，天主教方面就倡議要出版一本「聯合譯本」，而且也因這樣的想法與聖經公會有了初步的接觸，這個主張當然不可能獲得其他小宗派的基要主義者所認同。同樣的像盧祺沃、賈嘉美、陳維屏，以及有《福音報》為喉舌的中國平信徒傳道會的黃約翰者流，就對共同翻譯表示全盤的質疑和否定。這個矛頭指向了當時聖經公會的會長賴炳炯，基要派分子危言聳聽地指出基督教將毀於這群人之手，因而倡議另組一個聖經公會印刷「正統版」的聖經。

梵二之後，天主教與基督教在共同譯本的工作上積極展開了合作，各宗派代表於1968年開始討論「各教派合作翻譯聖經的一些指導原則」，由聯合聖經

¹⁰ 因為與天主教和長老會來往過密，周聯華被教會圈子裡的人懷疑其信仰是否正統，儘管已選上為下一屆浸信會神學院院長，但仍硬生生地被拉下馬，除了被要求不再與天主教和長老會人士往來，還要他撰寫「信仰告白文」(confession)，以昭告天下。可另參見曾慶豹(2016)。

公會的執行委員會及梵蒂岡促進基督徒合一秘書處同時以五種語言發表。雙方代表於1969年6月23日召開第一次座談會，主要是注意到天主教與基督教聖經中不同的人名、地名及其它固有名詞，先從此簡單的方向著手，並且建議編製對照表，加註希伯來文及希臘文譯音等（房志榮，1970）。

1970年1月5日舉行第二次會議，迎來了聯合聖經公會翻譯部主任奈達（Eugene A. Nida, 1914-2011）於會中報告未來工作計劃，接著同年6月25至7月4日在東海大學舉行「聯合聖經公會東北亞區譯經研習會」（U. B. S. Northeast Asia Translators Seminar），同樣是由奈達來主持，與會者包括來自香港、越南、菲律賓、韓國、日本各國等地的學員，連講師及服務人員在內共有五十六人之多。1970年8月3日，在臺灣聖經公會的召集下成立了「漢文聖經統一譯本籌備委員會」¹¹，然後在1971年10月開始翻譯和校對的工作，由許牧世牧師主持，劉緒堂、陳維統、韓承良、房志榮等神父參與校閱。

1971年10月，《現代中文譯本》正式的翻譯和校對工作還是順利地開始了。設總聯絡人一位駐於紐約聯合聖經公會總部，從事各方聯絡工作；翻譯者一人將《現代英文譯本》（*Today's English Version: TEV*）譯成中文，再將譯稿分發給八位華人聖經學者，請他們將譯稿與新約希臘原文相較，以確定其正確的意義和是否忠實的譯出經文。天主教的三位代表也都在這審閱組裡工作。經過多次往返修改，最終讓譯者及其他顧問定稿，這項工作最終的成果即是1975年出版的《給現代人的福音：新約全書現代中文譯本》（*Today's Chinese Version: TCV*）的基督教版和天主教版。¹²

儘管《現代中文譯本》並非直接從原文聖經翻譯過來，但就合一運動之理想而言，此書的出版可謂是合一運動的重大成果。1975年天主教發行了《現代中文譯本》新約全書，羅光總主教簽署該譯本的印行，並附有「天主教版序言」。天主教對於這個譯本可以說是照單全收，表現出了最大的誠意，羅光總主教（1975）特於天主教版的序言中清楚言明：

¹¹ 香港《公教報》（1970/3/21，1970/8/10）報導並肯定是次會議的召開與合一運動的關係，見區可茵（2017）。房志榮（1976：609-621）。通過此次的合作，大家共同擬定了一篇「國語新約翻譯指導原則」，房志榮讚賞這些原則實在是經過千錘百鍊的第一流作品，成為爾後作為指導中文聖經翻譯最佳的翻譯原則。

¹² 房志榮（1976：614）。另見許牧世詳述了現代中文譯本多處不同於和合本的範例，見氏著〈簡介現代中文譯本聖經〉，收入氏著（1983：191-208）。

一九七〇年以前，在臺灣聖經公會的推動下，天主教和基督教也曾開會討論過合譯一本公用聖經的計劃，以統一專有名詞為起點，結果因無法繼續而擱淺。這次失敗的經驗促成了《現代中文譯本》進行方式的改弦更張；暫不管專有名詞，即刻去譯聖經正文。

因此，現在刊行新約全書「現代中文譯本」天主教版時，就不必有什麼更動。連那些專有名詞，除了「上帝」改為「天主」，「聖靈」改為「聖神」，舊約中的「耶和華」改為「上主」以外，其他也都不必更改。

確實如此仔細閱讀《現代中文譯本》的聖經目錄以及最後所附的名詞淺註，就可看出其在文體辭彙上確與天主教所熟悉的用法多有不同，尤其是名詞淺註還極有可能會引起教義或說法上的爭議。換言之，如果不是封面上特別標示，是很難看出《現代中文譯本》新教版和天主教版有何特別不同之處的。¹³

《現代中文譯本》可以說是天主教與基督教合一運動的隱性成果。它之所以是隱性成果，主要是天主教只接受新約部份，而基督教則並未公開說明這是聯合翻譯的成果，僅僅只能說是將聖經譯成現代淺顯易懂的中文，以利於傳福音。1979年完成並發行了全本新舊約版的《現代中文譯本》時，這個譯本面對的已不是之前和天主教合譯的爭論，而是內文的部份翻譯被保守的基要派質疑和批判為「修改聖經」，周聯華在此事件中成了眾矢之的。起先是批評將「童女」譯成「少婦」，接著是因為一段聖經的翻譯而起爭端。¹⁴

1991年4月10日出版的《新使者雜誌》第三期，刊出了駱維仁一篇名為〈耶穌有罪性嗎？〉的文章，主要綜述他在翻譯現代聖經中文譯本時遭遇到的一些困難與問題。這篇文章中最關鍵的一段，即是解釋譯本中針對羅馬書8章3節的翻譯。這篇文章引來了一場批鬥大會，尤以中華福音神學院系統的代表（黃子嘉、王長淦）對該中文譯本強烈不滿。¹⁵終於，在1991年11月14日下午，由聖經公會出面召開面對面的交流會。該會的出席者約有十五位之多，

¹³ 《現代中文譯本》的天主教版，在封面上說加註，以及內文一開始加附有一篇羅光（1975）。

¹⁴ 《現代中文譯本》新舊約全書最大的突破是，「上主」或「主」取代了耶和華，這樣長期熟悉使用和合本的人而言，也是一次重大的改變。

¹⁵ 《現代中文譯本》翻譯羅馬書8章3節引起的爭論，華神院訊曾有兩篇文章做出反應，一是林道亮的〈「童女」抑「少婦」？〉，載於《華神通訊》第242期（1990/12/5），以及陳藹宜的〈罪性知多少？〉，載於《華神通訊》第259期（1992/5/5）。

其中一位華神董事及國語禮拜堂代表王長淦長老的發言中，有幾段極為激烈的言詞，以下摘錄部份：¹⁶

.....聖經公會如果改變了，如果變質了，重組聖經公會！我想與我同樣感覺的人還是有。.....還有一個感想，聖經公會權也太大了，幾個人可以掌握這一切，要改就改，要修就修，要換就換.....痛心！痛心！.....

.....你（指周聯華牧師）跟他（指駱博士）走一路。（張德麟，2001：450-454）

值得注意的是，最後一段話明確地是指著周聯華說的：「你跟他走一路」。然而，了解事實的人應該知道，不只是最後這一句話才指向周聯華，所有斥罵駱維仁的話都可以算是在斥罵周聯華，因為現代中文譯本和周聯華的關係最為密切，他被視為始作俑者（周聯華，2010：110）。¹⁷

天主教與基督教共同接受的《現代中文譯本》固然是一項重大的突破，但也僅僅限於新約聖經的部份，而且這個譯本實際上是根據一本現代英文譯本翻譯的，還不是直接從聖經原文譯過來。況且，天主教也因為次經未能納入，以致他們也僅能接受新約。基督教方面則最終完成新舊約全書，正式於1979年發行。然而，經過《現代中文譯本》的合作經驗，雙方代表都認為時機已逐漸成熟，可以進一步合作進行聯合翻譯聖經。於是，聖經公會於1981年8月10日另組織了非正式的小組會議，後又再經過兩次會議，雙方在對譯名的想法上取得了絕大部分的共識，因此開始準備著手真正意義的「聯合譯本」（房志榮，1982）。

經過了上述的前置工作，聖經聯合翻譯委員會最終於1987年2月順利成立，並於臺北舉行了第一次會議。出席者包括周聯華、駱維仁、歐可定、蔡仁理、房志榮、韓承良、劉緒堂，後三者為天主教神父，其餘都屬聖經公會代表。

¹⁶ 這是張德麟根據錄音帶整理的，見（2001：450-454）。

¹⁷ 反對「重譯中文聖經」同樣是護教反共時期的一個重大的事件。1964年針對聖經公會主張重譯中文聖經這件事引起了巨大的反對風浪，同樣又是被扣以「新派」或「不信派」等罪名，甚至還說天主教正偷偷摸摸地以共譯聖經之方式來清滅基督教，居心叵測。中國平信徒傳道會和其下的《福音報》（第201期起）大肆批駁，視這些動作都是「別有用心」、「向魔鬼讓步」，各教派紛紛打著護教的旗號，用最強烈的口吻反對。

此次會議確立了譯事的起始原則，決定由保羅書信開始，包括加拉太書（周聯華）、以弗所書（劉緒堂）、歌羅西書（韓承良）、腓利比書（房志榮）並於下一次會議前完成，會議也決意於 1990 年完成新約全書翻譯，並於隔年出版（房志榮，1988）。

經過一番討論，會議重點議決一個重大協議：統一「上帝」與「聖神」的稱呼。根據房志榮（1988）的說法：

天主教聖統及聖經公會各讓一步：天主教接受以「上帝」代替「天主」（只在這部合譯的聖經中，至於「天主教」的稱呼，及其他聖經本或禮儀本中的「天主」都仍保持原狀），聖經公會所代表的基督教會接受「聖神」的說法來代替他們慣用的「聖靈」（也只在這部合譯聖經裡用，其他的聖經可以不變）。（530-36）

可惜這個決定並未獲得主教團團長羅光總主教，及秘書長王愈榮主教的同意，最終的情況是在五月份的《主教團月誌》中有這樣一段記錄：

大家覺得有共同之聖經——合一本是好事，但是合一聖經是為大家念的，假如把聖經中的「天主」全改寫「上帝」，天主教教友在整部聖經中找不到天主，那大有危險。

結論：

贊同合一本之合譯工作，出版時可以不同譯名出版。

關於此一結果，房志榮（1988）深感遺憾，也認為希望彼此可以有更多溝通的機會，最後他清楚地表示說：

—合譯的大公聖經主要是為佔我國人口極大多數的非基督使用，天主教教友可以用作參考。

—生活的天主同樣可以用「天主」或「上帝」來表達、來尋找。

—以不同譯名出版聖經，就沒有合譯的大公聖經。

—合譯聖經小組建議的不是天主教放棄「天主」，基督教放棄「聖靈」，而是在合譯的大公聖經裡大家都同意採用「上帝、耶穌、聖神」來

表達三位一體的至上神，所有的基督徒用同樣的稱呼來向非基督徒作證，以利福音的傳播。

—必也正名乎？

—稱至上神為「上帝」更合乎聖經原文。(530-36)

顯然，房志榮之前的樂觀，看來是高估了天主教對上述名詞協議的接受能力。因為他曾說過比起基督教大小不一的教派和信徒，「天主教方面接受一部新的合一聖經不會遇到多大阻力」（房志榮，1982：479）。此事最終是周聯華函覆韓承良神父說：無論如何，工作可以開始，只要有開始才可能成功（原計劃於1990年完成），至於上述的困擾，彼此可以再討論，以避免傷害天主教為前提。¹⁸

聖經聯合翻譯委員會第二會議繼續召開，地點在香港，時間是同年的10月。會中再度確立了專有名詞的統一。此次會議討論了合譯聖經的目標，基督教認為是對內，天主教認為是對外，前者主張必須先獲得教內的認同，此譯經工作才有意義；但天主教方則以為，為使非基督徒可以更容易接觸或理解聖經才是目標，這比起要主教團批准更容易些。此次會議也議決了要向中國大陸天主教和基督教協會推介該項計劃，並希望他們下一次可以派代表參加。而較為特別的是，會中也議決敦請周聯華牧師向羅光主教解釋欲採用「上帝」一詞的原委。

誠如聯合翻譯在試行本《路加福音》的序言中所提及的：此事並非誰向誰讓步的問題，而是雙方代表以最大的誠意所欲達成的合一運動，在聖經名詞上的統一是合一路上的一大步，此一突破是難能可貴的（房志榮，1986）。然而，這樣的努力最終也只完成了《四福音書共同譯本》，於2015年對外發行。令人惋惜的是這個努力了快三十年的成果，也僅能到此為止，隨著周聯華牧師於2016年離世，至少目前此一計劃已停止。¹⁹

¹⁸ 周聯華函覆韓承良神父轉述自前引文，見房志榮〈福傳大會前談譯經〉一文。

¹⁹ 每週的星期五，周聯華隻手前往輔大神學院與房志榮神父討論共同譯本的譯文，曾調侃說是因為想念神學院週五午餐桌上的那條魚。周曾說到，《四福音書共同譯本》中天主教神父同意將第四本福音書的譯名採「約翰」而放棄「若望」的故事，宛如以馬忤斯路上的事件，因為四本福音書要天主教一方放棄堅持譯作「若望」，只能被理解為是天主的奧蹟。

肆、「分離的弟兄」中的「決裂的弟兄」

隨著普世教協的成立，基督教世界向天主教先行主動釋出善意，開始邀請其列席會議。與此同時，梵蒂岡第二次大會也重新看待「分離的弟兄」，但在一切看似一片祥和之際，港臺基督教界的華人教會卻再次掀起質疑的波瀾，並開始出現激烈批判天主教的言詞聲浪和出版刊物。這裡可留意到有三造主要人士即：中國信徒月刊社的王永信、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的趙氏父子（趙中輝，趙天恩），以及香港福音堂的創始人之一吳主光。

中國信徒月刊社創辦人王永信的言論發表於自 1964 年開始出版發行的《真道手冊》，其中指責天主教為啟示錄十七章所言的「大淫婦」。由於此書乃免費贈閱，因此也是流傳最為廣泛、影響至為深遠的刊物。此外，對於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所代表的華人教會，以及普世教協而言，王永信更是已與反對派結為朋黨。王永信的《真道手冊》於 1964 年出版，不到兩年，印刷了兩萬四千本，配合臺灣島內教會的情勢，加入護教反共、反對以長老教會為首的「百年大會」。左手打著反對普世教協的旗號，右手則毫不留情的強烈抨擊天主教（曾慶豹，2016：90-103）。

王永信後來成為全球華人教會一個聯合性組織「世界華人福音會議」的主要推手和主席，儼然成為一位華人教會「合一」的領袖。他代表此一組織積極出席世界基督教福音派的各個大會。2000 年後的《真道手冊》漸漸修正其對天主教的看法，認為他們已經有所「改善」，修正他曾定義其為異端的主張；甚至為了讓簡體版的《真道手冊》可以在中國大陸流通，也修改了他對普世教協的指控，不再稱他們為異端，以免得罪三自教會。然而，毒害華人基督徒極深的《真道手冊》曾如此形容天主教：

從創世以來，在上帝的教會中犯罪最深，迫害信徒最烈，更大加添聖經教訓最多，傳播異端邪說最廣，從眾及組織最大的集團，就是羅馬天主教。（王永信，1975：24）

王永信列舉了天主教「十一條」的異端思想，並以「真道辨」來反駁。以其後來在華人教會取得「第一把交椅」——世界華人福音會議主席的位子，加上此一小冊以免費贈閱的方式擴散，不斷地印刷再版，恐怕是華人基督教史上

影響最深、最廣的一本書。可以肯定的是，凡被王永信指名的，都難以在華人教會中獲得同情（具有 WCC 背景的除外）。

再者，為針對天主教與基督教準備藉著聖經合譯工作推動合一運動的努力，王永信（1974）也對《現代中文譯本》的翻譯計劃大肆批評。他在《中信月刊》上發表了嚴正的公開啟事，指控聖經公會出賣了信仰：

近年來，有些聖經公會因逐漸受新派信仰的影響而漸漸走入違反聖經的「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路。有的聖經公會正在計劃與天主教聯合翻譯中文聖經，並可能將「次經」也列入中文聖經之內。（次經，又稱偽經，是聖經以外的一些書信，為天主教所承認而成為天主教聖經的一部分，但純正信仰的基督教否認這些書信與聖經有同等價值。）這些聖經公會日漸在信仰立場上之妥協，是一件嚴重的事，將直接影響每一中國信徒及整個中國教會。（王永信，1974：4）

中國信徒佈道會董事會於 1973 年 8 月 11 日在芝加哥，集結了臺灣、香港、菲律賓分會代表，議決自行印刷發行聖經，指稱為「擁護忠實無誤的官話和合譯本」，預定 1975 年發行所印製的聖經。

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的趙中輝，從反對 WCC 的立場來反對天主教，他認為 WCC 之舉為一種「大背道」，出賣了路德改教與天主教對立的結果。基督教改革宗主義信仰翻譯社於 1955 年再次印行民國在大陸時出版過的《羅馬教內幕》（此書為丁良才所著），以及另外發行如《羅馬天主教會》（1966）之類的小冊子，目的就是要維護「正統」的改革宗思想。趙中輝的兒子趙天恩曾投書反對 1964 年臺灣島內開始的「聯合祈禱會」，凡與天主教或是 WCC 接近的，都被他視為是偏離了傳統福音信仰的正道（曾慶豹，2016）。

趙中輝在其所主編的《信仰與生活》雜誌中，主要集中精力於批判他所定義的「新派神學」。其中當然也包括了對普世協會和天主教的批評。趙（1966）在《羅馬天主教會》的序文中建議（王春光譯，1966：2）：

讀者不妨把這本小冊子和時下一些主張基督教與天主教合流的刊物或文章對照來讀，就會知道我們唯一的權威就是基督耶穌在聖經中所說的話。但願藉這小冊子能夠幫助一些基督的真門徒，對於今日這個嚴重危機的問題，得到一個清晰且明確的答案。（2）

言下之意，合一運動正威脅著基督教的信仰立場，而且是一項基督教歷史上的重大危機。

前職中華福音神學院第一任教務長的趙天恩，曾在《華神通訊》中回憶他個人蒙神呼召，從而傳道與委身於神學教育的經歷，他「進入學術有名、信仰純正的韋斯敏斯德神學院」後「大量地吸收聖經真理」。在求學過程中，他曾於 1964 年休學並短暫到臺灣做了一些考察：

我在臺灣那年正是基督教來臺百週年紀念的節期。我發現那個紀念的後面好像有普世教聯（按：即普世教協）合一運動的影響。普林斯頓神學院院長馬克德被請為主要講員，所講的也不外於推動那個合一運動的話。一九六六年一月推動合一運動的人在臺北首次與天主教舉行聯合禱告會。福音派人士大吃一驚，轟動一時，好像不知道那是普世教聯在世界各地推行已久的工作。身居異國的一群中國神學生聽到這類的消息何不痛心！對祖國教會的關懷使我們在韋斯敏斯德的中國神學生常在一起討論本國教會的需要與難處。²⁰

趙天恩在此直接點名批評普世教協，字裡行間充滿了其對合一運動的敵意，並暗示了臺灣的福音派人士若未能及早察覺此合一運動，則將會給教會帶來嚴重的「危機」，尤其是與天主教的密切互動，更是觸動了這位韋斯敏斯德派在台代表的敏感神經。²¹

福音堂的吳主光則是藉著種籽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反天主教的書籍，是三大反對勢力中著力最多、最持久的，打擊天主教似乎已成了這位海外神學院副院長吳主光鮮明的思想工作之一。吳的《基督教與天主教的分別》，由香港種籽出版社出版，此小冊不到六十頁，1977 年 5 月初版，至 1983 年 5 月為第三

²⁰ 趙天恩（1971：3）。之後收入中華福音神學院（1972）。

²¹ 台灣國語教派大老級人物、華神成立的董事長吳勇，在他的回憶錄裡津津樂道他是如何地「衛道」，其中最為明確的即是與天主教劃清界限，所以，對於任何與天主教「聯合」之舉，甚至只是同台出席，都極其地敏感，比對待「不同宗教」的人還更加地抗拒。因為普世教協即是從事合一運動的基督教團體，天主教當然是合一工作上最為重要的伙伴，但在這些未經過神學教育的「地方教會」背景的人眼裡，一旦碰上與天主教的合作，都是表現激烈反對的，基本上他們都視天主教為離經叛道者。（1991：203-213）。吳勇在其批評天主教的問題上不是根據教義出發，竟是根據歐洲教堂中有許多耶穌、馬利亞、聖徒等人的雕像就說成是「偶像崇拜」的證據，加上看到天主教徒向著聖像合手祈禱，更是認為天主教拜偶像即是事實。

版，共計印了近七萬本，估計到現在已超過十萬本。如同這一系列其他的小冊子一樣，這是基督教佈道的工具書，為致贈他人之作，所以流傳極廣，也最具影響力。

《羅馬天主教的福音》（2001）是吳交由種籽出版社發行出版的譯作。此外，他也翻譯出版了《葛培理與羅馬天主教》（2003），以及《祈理魁神父傳》（2002）。前者為批判葛培理（Billy Graham，台灣譯作「葛理翰」）的「新福音派」，意指其已走向歧路；後者的原作者則是有「北美馬丁路德」之稱的祈理魁（Charles Chiniquy），此書封底文宣特意指出：「讀者若想要挽救一個天主教朋友脫離天主教，這本書是最值得推薦的，因為它不但提供真實的見證，更在教義和邏輯上指證天主教的錯謬」。上述這兩本書，吳都參與了翻譯，基本上都認定天主教為異端（吳主光譯，2001，2003，1998）。

吳對教會合一運動，以及新教教會與天主教的關係窮追猛批，包括之後他對靈恩運動的批評，也牽連到與批評天主教有關。他質疑若天主教內也有靈（神）恩運動，那基督教的靈恩運動也是有問題的，甚至將這一切發生在教會中的現象推之為一種末世徵兆，即暗示著審判即將到來。2003年出版的《教會大合一運動可以接納嗎？》，吳基本上總結了他的論點，定義天主教為異端，這與早年王永信的說法是一樣的。

在批評天主教之時，吳主要是扣緊那些福音派人士，或針對那些主流的基督教派，以防他們做出將會受到質疑的行動，而這些行為當然是與被他視為異端的天主教互動甚至聯合，這些都是離經叛道之事。尤其是被所謂福音派認定為代表著正統信仰的葛培理，更是成了他批判的主要對象。對他來說，正是這些所謂正統的代表都紛紛走向偏差，所以作為福音堂這類小宗派的地位才更加得以突顯。吳認為，現今處於末世階段，其特徵即在於必有許多背道的事，就像葛培理這樣一位原被視為正統的福音派人士，最終也與天主教往來，走上普世合一運動的道路，以出賣福音信仰為其代價（吳主光譯，2003：11-12）。

吳進一步解釋說，從上個世紀八零年代開始，被視為福音派的正純信仰人士都紛紛妥協退讓。先是美國富樂神學院發起的第三波靈恩運動，帶動與天主教聯合，再加上著名的葛培理佈道團長期以來與天主教聯合，並促成了1994年普世基督教福音派二十幾位著名領袖，與天主教簽署了第一次“Evangelicals and Catholics Together”聯合宣言。到1998年再簽署了第二次，越來越廣泛地與天主教聯合（吳主光譯，2001：7）。首先是聖公會宣佈與天主

教聯合，繼而世界信義會於 1997 年宣佈與天主教聯合，香港基督教出版界曾大量地翻譯並出版了美國天主教神父盧雲的靈修小品，也被吳予以撻伐。他認為此種信仰為一種背道，向天主教大大開放等於接受異端，強調這個教會大合一運動，是從始祖亞當以來，從來沒有過的龐大規模「離道反教」運動。看來，帖撒羅尼迦後書二章所說的末世現象，已經實現了（吳主光，2003）。同樣是種籽出版社，2006 年又出版了一本三百多頁的書：《騎在獸上的女人》（梁偉民譯），書中扉頁介紹文宣寫著：

此書謹呈獻給曾接受羅馬教廷錯誤信息至今為數近十億的天主教教徒及對羅馬主教真相不知情的四億名新教信徒並來自雙方的真殉道者。

從某個角度看來，天主教是處於挨打的劣勢。他們順服梵二的合一精神，因此盡可能以溫和的態度回覆各方質疑，坊間可以見到如《新答客問——答覆基督教朋友的質疑》（徐錦堯編著，1998）、《天主教徒如何面對基督教朋友的質詢》（楊孝明，2007）等這類回應的小書。

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基督新教的基要派代表，天主教在合一的努力上還是較為積極的。臺灣光啟社於 1967 年出版了孔漢斯《為使世界相信》（1962）的中譯。該書即是以合一運動的主題，以天主教教友為寫作對象，陳明如何看待基督徒並與他們建立起在信仰前提下的關係。然而，更值得注意的則是，在教理問題上，即是出版了由湯漢主持，香港公教真理學會聯合翻譯共出版五卷本《合一教理》，第一卷於 1977 年出版，直到 1982 年完成出版第五卷。

《合一教理》原書名為 *Neues Glaubensbuch: Der Gemeinsame Christliche Glaube*，是集德、法、及瑞士等國十二位天主教和基督教神學家共同尋求信仰合一的重大成果。這項計畫由 1969 年末開始，至 1973 年完成並於弗萊堡出版，是梵二後努力取得的重大成果。英文版 *The Common Catechism: A Christian Book of Faith* 就有六百多頁，內容針對天主教與基督教共同的信仰教理展開，相同或不同之處都有非常清楚的說明，是一本具有高度價值的書。（湯漢，1977）而中譯本的第一卷如此迅速的完成並出版，可見天主教對合一運動的重視。

事實上，在合一運動的工作中，相較於聯合祈禱會或共同聖經譯本，基督教與天主教在教理問題上的分歧恐怕是最難處理的。本書一大特色即是從救恩史的角度切入，並闡述了福音的社會向度，因而通過兩大教的基本教理闡發，

進一步地推進了信仰促進社會改造的責任，從而避免了雙方陷入教理論辯或爭執而停頓的可能性，將信仰的重點放在如何將之落實到生活中，以見證上帝在歷史上的作為。這也是合一運動的理想和目標。

《合一教理》共分五卷，前四卷分別闡釋了有關上帝、聖經啟示、耶穌基督、基督徒信仰生活和世界等問題，第五卷最為特別，因為它交待了各項目前各教會尚未完全取得共識的觀點，雖然大部分的論題在前四卷都說明清楚並排除了不必要的誤解和偏見，但對於聖經與傳統、恩典與行為、聖事與教制等等，眾教會仍然存在著一些不易化解的難題。換言之，第五卷即是闡明了合一的障礙。無論如何，在彼此都忠於自身的傳統下，《合一教理》已取得了極大的突破，我們有理由相信，天主教在合一運動的態度和行動上比基督教更為積極開明，這除了因為合一是天主教會的法令之外，更根本的恐怕是通過了對教理的辯明，使天主教神父或教友更加的確定合一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合一教理》從撰寫到譯成中文，實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照理也是一件大事，然而，基於種種複雜的情勢，也就削弱了其強大的潛在影響力。至少我們完全看不到在天主教或基督教任何一方對此書有過深入的討論。事實上，臺灣天主教會交談的努力和成果方面，更多是積極地表現在與其他宗教的交談上。相對的，對於與「分離的弟兄」的交談，據筆者所知，「教理的對話」在台灣還未曾出現過。

伍、漢語天主教更大的隱憂

混亂、異常的混亂，似乎許多輸入到中國的東西，都會變得「具有中國特色」，革命的變反革命、左派變成保守的當權派，完全變成四不像。

在漢語的語境中，Christianity 這個詞的翻譯竟變得非常困難，「基督宗教」的譯法仍不普遍為人所熟知。不論天主教或是新教，不論英語（God）或是德語（Gott），上帝就只有一位。然而，在漢語的世界裡，上帝卻是兩位或甚至三位之多，有天主，上帝及神的名字，因而有不同的「聖號」。

在英語世界，Christian 泛指所有追隨基督耶穌的人，但在漢語世界譯作基督徒之時，卻只是指基督（新）教會的信眾，而不包括天主教會的信眾在內。後者成了「天主教徒」，按字面的意思看來，天主教則成了「拜上帝的教」，他們是信仰天主的，基督（新）教則是信仰基督的，所以稱作「拜基督的教」。

更別說和合本與思高本之間的差異，諸多不同的譯名，聽起來，完全難以想像是指信仰同一位神。

不過，天主教在這方面應該要比較擔心的是，在教友的圈子外，包括漢語學界，不管是學術文章或是閱聽傳媒，思高的譯名並不如和合本的譯法來得普及。換言之，在現實的處境中，中國天主教正面臨了一項鉅大的挑戰，那就是外界對於思高本的譯文已越來越陌生，這對天主教的福傳是一大隱憂，天主教的出版在慣用語上已明顯地處於劣勢。相較於「分離的弟兄」，漢語天主教更應該正視此一問題。這絕對不是一件小事，因為這已不純粹是與「分離的弟兄」合一與否的問題，更是與漢語世界語境接軌合一的問題。

輔仁 宗教研究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 方豪（1966.11）。〈在臺灣的合一運動〉，《鐸聲》，頁31—39。
- 王永信（1974.1）。〈特別啟事〉，《中國信徒月刊》，第13卷第1期。
- 房志榮（1976）。〈新約全書「現代中文譯本」的來龍去脈〉，《神學論集》第26期：頁609—621。
- 房志榮（1982）。〈合一聖經與大公主義〉，《神學論集》，第53期：頁475—477。
- 房志榮（1986）。〈合一聖經會議在香港舉行〉，《鼎》，第35期：頁27。
- 房志榮（1988）。〈福傳大會前談譯經〉，《神學論集》，第74期：頁530—536。
- 房志榮記錄（1988）。〈聖經合譯委員會第一、二、三會議記錄〉，《神學論集》，第75期：頁16，26，34，44，94，132，142。
- 房志榮記錄（1988）。〈聖經合譯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記錄〉，《神學論集》，第78期：頁496，540，552。
- 林道亮（1990.12）。〈「童女」抑「少婦」？〉，《華神通訊》，第242期。
- 區可茵（2017）。〈中文聖經與合一運動（1965-1970）〉，《神思》，第113期。
- 陳藹宜（1992）。〈罪性知多少？〉，《華神通訊》，第259期（1992/05/05）。
- 項退結（1963.11）。〈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與合一運動〉，《鐸聲》第十三期：頁23—29。
- 趙天恩（1971.6）。〈呼召與帶領〉，《華神通訊》。
- 陸達誠（1969）。〈天主教合一運動的新里程〉，《神學論集》第1期：頁95—109。
- 曾慶豹（2012）。〈馬禮遜《聖經》譯本辨正〉，《世界漢學》。第9期：頁11—24。

專書論文

- 田燕妮（2014）。〈《兩教辨正》闡釋〉，陶飛亞主編，《宗教與歷史》（第二輯），253—264。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
- 張德麟（2001）。〈駱博士與新使者雜誌〉，《聖經、詮釋、實況—駱維仁博士榮退紀念文集》，頁450—454。臺北：永望文化出版事業。
- 許牧世（1983）。〈簡介現代中文譯本聖經〉，許牧世、黃耘蔚，張興仁著，《經

與譯經》，頁 191—208。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專書

- 王永信（1975）。《真道手冊》第十版。臺北：中國信徒佈道會。
- 中華福音神學院（1972）。《如雲集：中華福音神學院師生見證專輯》。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
- 吳主光（2003）。《教會大合一運動可以接納嗎？》。香港：種籽出版社。
- 吳勇口述、何曉東整理（1991）。《不滅的燈火—吳勇長老回憶錄》（上）。臺北：宇宙光出版社。
- 周聯華（1994）。《周聯華回憶錄》。臺北：聯經出版社。
- 周聯華（2010）。《我的一生》。臺北：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 房志榮（1979）。《天主教與基督教聖經的異同》。臺南市：聞道出版社。
- 柯德烈（1898）。《耶穌真教》。河北縣天主堂。
- 倪維思（1913）。《兩教辯正》。上海：美華書館。
- 徐萬黎編著（1959）。《馬丁路德為何要作改教運動》。臺北：臺灣宣道社。
- 徐錦堯編著（1988）。《新答客問—答覆基督教朋友的質疑》。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
- 張雅各伯（1907）。《邪正理考》。上海：土山灣。
- 漢文聖經統一譯本籌備委員會（1975）。《現代中文譯本天主教版》。香港聖經公會。
- 陸地愛（1922）。《駁耶穌教》。上海：土山灣。
- 曾慶豹（2016）。《約瑟和他的兄弟們—護教反共、黨國基督徒與台灣基要派的形成》。臺南：教會公報社出版社。
- 湯漢主持、香港公教真理學會聯合翻譯（2002）。《合一教理》，共五卷。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 楊孝明（2007）。《天主教徒如何面對基督教朋友的質詢》。香港：塔冷通心靈書舍。
- 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2013）。《公教會之信仰與倫理教義選集》。臺北：光啟文化事業。
- 羅光（1975）。〈序言〉，《現代中文譯本 天主教版》。香港聖經公會。

翻譯書籍

- 王春光譯（1966）。《羅馬天主教會》。臺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David Martyn Lloyd Jones, 1964）
- 孔漢斯著，譯者不詳（1967）。《為使世界相信》。臺灣：光啟出版社。（Hans Kung, 1962）
- 吳主光等譯（2001）。《羅馬天主教的福音》。香港：種籽出版社。（James G. McCarthy, 1995）
- 吳主光譯（1998）。《祈理魁神父傳—近代天主教改革勇士》。角聲。（Charles Chiniquy, 1961）
- 吳主光譯（2003）。《葛培理與羅馬天主教》。香港：種籽出版社。（David W. Cloud, 2000）
- 李憲堂、侯林莉譯（2005）。《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Timothy Richard, 1916）
- 梁偉民譯（2006）。《騎在獸上的女人》。香港：種籽出版社。（Dave Hunt, 1994）
- 顧長聲譯（2004）。《馬禮遜回憶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Eliza A. Morrison, 1839）

網路資料

- 羅馬天教廷（1964）。〈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大公主義》法令。2018年7月29日，goo.gl/RH8Amb

原始報刊

- 《福音報》
《公教報》

Roadblocks on the Path of Chinese Christian Ecumenical Movements

CHIN Ken-Pa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Christianity, in the forms of Catholicism and Protestantism, has not only reached China and various Chinese communities at different periods, but is also based on different forms of missionary background and ideology. Since the Reformation 500 years ago gave birth to Protestantism, the movement has diversified in various ways in the Western world. In Chinese Christianity, these diversifications have often become standoff points in comparative discourse regard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atholicism and Protestantism. Chinese Protestantism has inevitably devised its own unique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e in regard to biblical exegeses, catechism, and doctrine. Hence, the discourse of comparison between Catholicism and Protestantism often focuses on their sharp deviations instead of what they hold in common. In addition, such deviations sometimes even cause internal splits and persecution within the Protestant community itself. Therefor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further conducive discussion of the topic of ecumenical issues, it is necessary to pinpoint and clarify some of the deep underlying misconceptions and twisted arguments in regard to this subject. Henc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mportant writings, representative figures, and events concerning: 1. Catholicism: ecumenism and anti-ecumenism with regard to Protestantism; 2. From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to Bible Translation: the epic centers of conflict.

Keywords: Catholics, Protestants, Ecumenical Movement, Anti-Ecumenical Movement, Bible Translation

輔仁
宗教研究